

毛泽东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重大贡献和现实意义

曾天雄,夏小凤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其关乎全局,更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毛泽东一直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夺取并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由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学习、积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以及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确立、坚持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凝聚了人民精神力量,夯实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拉紧了共同的精神纽带,筑牢了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防线。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001-07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制度自信的基本逻辑与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创新。这一表述,与毛泽东一直以来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夺取并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一脉相承。

一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奠定了思想认同基础

宣传学习,主要是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共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党的一项最

基本的经常的任务。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形成的决议也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①

1949年至1952年这个历史阶段,我国主要的社会矛盾表现为中华民族同三股旧社会残余势力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斗争。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全国领土的基本解放,1952年至1956年这个历史阶段我国主要的社会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学习运动领域,主要表现为分阶段展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学习。具体来讲,第一阶段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

(一)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

收稿日期:2021-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KS035);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19WTB15)

作者简介:曾天雄(1963—),男,湖南永兴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①。在与各种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斗争中,党和政府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②;另一方面,根据党和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个体经济存在的基本政策和社会现实,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③。

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表现为: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强调思想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重要任务;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坚持阶级斗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提出“双百方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阐明理论和哲学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要求广大革命战士学习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观点”^④。

(二) 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学习

1952年9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间、方法和步骤进行了全面的战略思考,得出了新的重要结论。接着,在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⑤的战略设想。根据《毛泽东传》的记载和薄一波的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⑥。但是,面对这样的重大战略转变,一些领导干部无论在具体理论还是政策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思考都存在一定差距。195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干部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错误观念及时予以批判的做法,要求全党“务必抓紧对党员首先是干部进行教育和批判”^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撰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向全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转发了这个提纲。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提纲是对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极佳教材,提纲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论和设想进行了具体阐释,提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我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系统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纲指出:“把以剥削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全民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⑧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学习,广泛而深刻。人民群众学习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种种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创新与发展。从之前的不理解到深刻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施的方针、步骤等,全国人民的力量很快就得到了动员和凝聚,积极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总的来讲,这一个时期内,配合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开展执行,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学习方面侧重于工农联盟、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宣传学习和教育,主要目的在于让全国人民认识和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

二 在与错误思想斗争中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④王永贵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⑤《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⑥《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版,第194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3—694页。

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批判旧世界,就是重视已成形态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的与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唯心论错误思想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提供方向和目标。

(一)对封建残余思想的批判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这次运动从1951年5月开始至7月底结束。虽然这次运动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但其影响却很深远。武训生活在清朝末年,年少丧父,跟着母亲乞讨度日。当武训年纪稍微大些,因为屡屡受到恶人羞辱欺压,于是把受苦的根源归因于不识字、没有文化,于是发大愿“行乞兴学”,以乞讨所得之资救济贫穷人家的孩子上学读书,接受教育。50岁之后,武训在山东堂邑创办了三所义学,帮助了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原本武训做的这些事情是善事且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意义,可是经由《武训传》电影编导人员的加工制作,武训却成了不屈不挠地为中国人民解放献身的“先贤”。电影公映后,得到包括中央高层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大多数人认为武训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但也有极少数文章认为“武训精神”不足为训。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敏锐地觉察到电影《武训传》涉及的问题重大,比如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这样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经由毛泽东最后修改并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从阶级立场、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关于电影的评论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如何看待农民革命斗争、如何看待中国解放道路的问题。

社论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③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自此开始。

不可否认,文艺评论的根本指导思想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应当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人物;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不应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应该对历史作具体的分析,而不应该在具体历史人物和思想面前丧失批判能力。显然,毛泽东的分析不是一般性地、就事论事地评论历史人物和文艺作品,而是以《武训传》为典型案例来分析当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阐明对待历史人物、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一个特殊视角来反对错误思想倾向,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④。诚如周扬所指出的:“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关涉中国近代历史的传记影片。对待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不是由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的,而是由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造成的;社会的黑暗不是由于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于人民自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会,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只需给人民以教育和文化,就可以达到新的光明的世界。”^⑤“另一种与上述观点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劳动人民在他们每天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地创造历史。特别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当新的社会力量起来和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时候,决定斗争的结局的总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⑥只有根据后一种观点来衡量和估价历史人物,才是正确的,才是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对旧的文学艺术遗产进行辩证取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起点。但是,用政治声讨而非民主讨论的方式对电影《武训传》展开批判,开创了以政治批判的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先河,其教训也是深刻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④金民卿:《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探索》,《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⑤《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⑥《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二)对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深厚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1954年末,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展开。事情的起因是李希凡和蓝翎撰写的批判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发表之途重重受阻,他们在文章中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所使用的胡适考据派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观点。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毛泽东在信中还明确主张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①。

1954年12月到1955年8月,当时全国各大报刊就发表了200多篇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文章主要涉及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及文学史观、考据学观点、哲学史观、“红学”观、禅宗史观等,这些批评可谓是一次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清算。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武装头脑既是历史逻辑使然也是现实实践使然。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面对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各种现象,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阵地主动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反之,就会被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占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求我们党在这一工作中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判断力、引领力,不仅要善于

发现错误思潮,并且要用正确方式加以批判、抵制和引导。

三 制度与立法建设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有制度和法律的支撑,只有这样才能转化为广大民众的信念,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主要不是思想,而是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资本主义统治既不是建立在物质性的高压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思想和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在对普通大众的制度信念的塑造和操纵基础上的。”^②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也明确指出,意识形态不是观念,而是“各种私人的和公共的制度,包括教会、公私教育系统、家庭、法庭、工会、媒体等等”^③。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新的新闻传媒、书刊出版制度

通过占领新闻传媒、书刊出版和群众宣传网等各种文化教育工具等舆论阵地,党的理论教育、政治宣传等意识形态工作明显加强,新中国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④只有掌控新闻传媒、书刊出版和群众宣传网等的优势,构筑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工作网络,才能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宣传阵地的开拓,切实保证了新意识形态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使之在整个社会的观念形态上占有统治地位。”^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传媒的性质界定为“党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等。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新闻总署,负责执行国家的新闻方针、政策,管理报刊等新闻宣传事业。新闻总署成立后,确定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作为全国的新闻舆论中心之一,并要求所有报纸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575页。

②汪行福:《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③Louis Althusser.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71, p.16.

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⑤杨俊:《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1期。

担负起指导中心工作的职能,这相当于把一般报纸“党报化”^①。接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遵照《人民日报》的办刊宗旨,陆续办起了本地的机关报。民主党派创办或者主管的报纸,也被要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目的是引导民主党派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对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中国共产党把其作为“进行思想斗争的重要工具,是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②。“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是书刊杂志出版系统“极其重要的政治工作”和“严重的政治任务”^③。面对多元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和建立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期刊杂志和出版机构,如1949年9月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创刊、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等。

(二) 相关法律的制定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多元文化局面。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没有完全确立,各方面体制机制并不完善,通过国家法律层面来确保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法律主要是指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载入1954年的我国第一部宪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展,到了1954年,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步入公私合营阶段。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的大规模学习宣传运动和批判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社会主义改造使得经济基础的变化,则为这

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写入宪法奠定了物质基础。基于此,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加以确立,既是理所当然,又是水到渠成。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明确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④的著名论断。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⑤这表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四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 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加强理论武装,形成合力

“灌输论”的思想源头肇始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曾突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恩格斯主张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灌输,反对只讲空洞的理论和将教条奉为圭臬的方法。考茨基对该理论做过系统的总结和完整的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考察了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史的基础上,依据俄国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形,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著名论断。列宁指出:“纯粹自发性的工人运动虽然表明了工人同资本家的对立,但是工人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⑥,并“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⑦。“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三)》,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③《改进报刊发行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人民日报》1951年3月10日。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522页。

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⑦《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组成部分,从外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桥梁,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保持自身战略阵地,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法宝。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改革深化过程中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多样多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新环境新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基于多元共生的不同历史文化基础,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交流与相互对冲呈现新特点,甚至有时趋于相互斗争且复杂尖锐”^①,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挑战。因此,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扬“灌输”理论精髓,大力在知识分子中发现、培养更多真懂、真信、真行的革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且使其在与西方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面对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一些妖魔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面对一些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言论,我们更要大力鼓励和支持这些思想家进一步坚持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②。如此,才能加强理论武装,凝聚民心、形成合力,引领全国人民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二) 积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捍卫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复杂、波诡云谲,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使人民更加追求个性独立自主自由,个体间的差异性不断加剧,不少错误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国外敌对势力加紧“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妄图冲击和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用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批驳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等错误思潮,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的影响。

一是要正确对待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文化的继承从来就不是全盘继承,而是一个选择、改造、推陈出新的过程。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今天,根本不可能退回到传统中去,再从传统出发来透视今天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的立足点蔽而不明,就会漂浮在传统中,处于无根基的状态。”^③文化的选择,既不是用西方文化来压倒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抵御西方文化。一切都是为了现实需要,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个实践,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独特的实践,由此“产生的新的文化,在本质上,自然也就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新文化”^④。诚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一幕。”^⑤

二是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毛泽东不仅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取舍,而且明确提出,要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强调以实践为基础,辩证取舍、批判借鉴,主张“有机地结合”,反对套用、拼凑、照搬西方,从哲学高度提出“学”无体用、不分中西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不以地域、民族性差异将文化划分为体用、主次、优劣的唯心主义观点看待文化问题,而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一切民族、一切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不管是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都可以不拘一格拿来为我所用。习近平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主臬,一

①姜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红旗文稿》2020年第5期。

②朱继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探索》2014年第5期。

③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④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①兼具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深邃的历史视野,积极吸收一切西方先进文化,做到“洋为中用”。“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正是为了创造自己本国的经验;尊重别的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更要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②

(三) 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法律法规

一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应当得到严格落实。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干部,必须加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精准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目标和方向,卓有成效地开展斗争;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对于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根

基、威胁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妨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各种风险挑战都必须坚决予以应对和斗争,在斗争的伟大历史实践中锤炼坚强的斗争意志、练就高超的斗争本领、铸造顽强的斗争精神。

二是要不断完善正面宣传舆论引导机制,积极引导网上正面宣传。阐释党的政策主张和重大决策部署,反映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对敌对势力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等一切错误言行“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通过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③。

Mao Zedong's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Upholding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of Marxism's Guiding Status in Ideological Field and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ZENG Tian-xiong & XIA Xi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 is a fundamental issue, which has to do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with whether the Party and nation will change color. Mao Zedong always emphasized that the proletariat thoughts should occupy the ideological field. He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adhering to Marxism's guiding status in China's ideological fiel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rough the large scale study and publicity of Marxism, active criticism of feudalism and the wrong thoughts of bourgeoisi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slation and institutions, Marxism's guiding statu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adhered to and consolidate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people has been gathered, the common ideological basis has been tamped, the common spiritual tie has been tightened,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fens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work has been built up.

Key words: Mao Zedong; Marxism; field of ideology; guiding status; elementary institution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9日。

②《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③侯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2月26日。